



史前中原文明的文化特质与文化观^{*}

曹建墩

摘要:中原地处南北、东西交通的汇合处,信息畅通,交流广泛,对异质文化有兼容并蓄的吸纳能力与改造能力。中原文化不务宗教玄想而务实际、重实用,祖先崇拜和祭祀礼仪更多被赋予了社会和政治功能,宗教祭祀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特征比较明显,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世俗理性与务实致用的价值取向。在长期的族群融合与政治实践中,中原社会逐渐形成了共同体道德意识,形成一种道德政治模式和以德治理的道德政治理念,其是以道德规范人的行为,以礼制来约束社会成员,从而使中原文化具有一种内敛、节制、中和的文化气质,也使中原社会形成了崇简尚朴、贵本节用的价值观和崇尚中和的政治观。中原文明这些文化特质和文化观念,使中原文化具有内聚性、向心力和强大的文化吸附力,更容易形成大范围的政治文化认同,对中原文明优势地位的形成具有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中原文明;文化特质;文化观;文明进程

中图分类号:K21;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5-0032-08

本文所谓中原,是指广义上的中原,主要指以现在嵩山周围为中心的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等地区。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代,以中原为中心的演进趋势已经形成,中原成为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源和华夏文明的熔炉。就像滚雪球一样,中原文明广泛吸收、融合其他文化,使自身越来越强大,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干和根脉。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和观念的产物,文明的演进也是人基于自然地理、经济形态等要素而有意识的创制。对于是什么样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促使先秦时期的中原社会走向了一条独特的文明进程,笔者认为,在其中有一种文化特质和文化观念,包括文明演进中形成的政治组织方式和政治策略,长期积淀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文化观等,可称之为“原始文明底层”。其形成了一个文明的基因,长期发展演进形成传统,从而沉淀并推动了华夏文明化进程。

一、中原文明的文化特质

中原文明的演进之路跌宕起伏^①,在文明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风格和文化品质,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原文明优势地位的形成。

(一)兼容并蓄的文化融摄与开放性

中原拥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是天下之中、八方辐辏之地。中原史前文化区明显居于中心位置,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着中原地区自古以来与周围各文化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就为中原地区吸收周围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丰富自己,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原地处四方之中的区位优势往往形成一种文化杂交优势。陈良佐指出,距今五六千年前中国境内形成的六大文化区中,中原区地处中心,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四周文化区都有文

收稿日期:2021-05-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20@ZH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建墩,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开封 475001),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化因子向其输入,如:燕辽文化区的庙、冢、坛的祖先崇拜,以南北为中轴、东西对称的建筑群,大豆作物和骨卜;甘青文化区的大、小麦,可能还有锡青铜的冶炼;长江中游文化区的水稻和有肩石器;江浙文化区的水稻及精耕细作的栽培技术、凿井技术、玉雕技术与玉礼器组合等;山东文化区的快轮制陶技术,陶鼎、蛋壳陶器等成组陶礼器,以及棺槨和骨卜。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就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与四周文化所产生的杂种优势文化^[1]131-159。龙山至二里头时期,中原文明兼容并蓄,吸纳四方文明之精华并加以融合创新。赵辉曾指出如下几点:第一,中原文明新出现的陶器品种不下十几种之多,如鼎、豆、单把杯、高柄杯、觚、鬲、甗、盂、鬯、斚和彩绘陶器等。其中有的与屈家岭—石家河文明有关,有的是受大汶口文明影响,还有的可以追溯到长城地带的北方。第二,石器制造技术不少是来自东、南方的要素。第三,在中原地区,目前仅在山西陶寺龙山文明遗址见到厚葬的风俗,以及用随葬品、葬具和墓葬规模等来表现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而在屈家岭文明、崧泽早期至良渚文明、大汶口文明花厅期和红山文明这一连串的周边文明里,厚葬风俗曾经很明确地存在。其中,对中原文明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大汶口文明。第四,在周边文明中发现的龙和其他动物外型,以及琮、璧之类玉器所表现出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原文明及其后续者所承继^[2]。考古学材料表明,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不仅仅在物质层面上展开,还包括思想、制度、政治等精神层面的交流,中原地区不仅接受了四方物质文明的精华,而且还接受了周边文化的思想观念。

中原文明对异质文化有兼容并蓄的吸纳能力与改造能力^[3]。河南禹州瓦店遗址中有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反映出中原文明化进程中有多元文化因素融入^[4]134-136,但据所出土的磨光黑陶觚形器,似乎表明瓦店遗址并非单纯的接收外来文化因素,而是在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5]。在史前文明的丛林里,中原是物资、情报、信息交换的中心。优势的地理区位使得当地人广泛吸收各地文明的成败经验,领会出同异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积累出成熟的政治、经验^[2]。由于这种政治智慧的早熟,也使

中原具有吐故纳新的胸襟与能力。这种能力也使后来的夏商周三代虽然王权易主,但后继王朝能够因时制宜的吸取前代文化,并采取一种文化扬弃态度,以服务于世俗王权政治秩序。

(二)世俗理性与务实致用的价值取向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聚落之间经过冲突兼并与融合,如滚雪球般凝聚成更大的集团。在政治治理中,仅仅依靠武力刑罚等暴力手段是很难将不同的部族凝聚成同一团体的,这就需要借助各种传统资源以达成政治整合,并促进不同部族或族群之间的共同文化认同,从而实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其中宗教祭祀成为可资利用的重要传统资源,从而超越其原初的宗教意义,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并由此成为强化早期社会政治权力、早期王权的意识形态。中原地区的巫教氛围并不浓厚,而是高度关注现实秩序,呈现出与周边地区不同的文明演进模式^[6]180-193。宗教祭祀的理性化、等级化、政治化发生较早,巫术与祭祀被纳入了礼制范畴,造成政治权力与祭祀的结合,无论是宗教神职人员,还是宗教祭祀的组织、功能,都是从属并服务于世俗政治。这也导致在中国早期文明中,并未发展出一个可与王权相抗衡的独立宗教集团。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私有制、社会分层与阶级的产生,并没有彻底斩断血缘关系,血缘组织(宗族、氏族等)成为社会架构的基础。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族群兴亡的重要保障,其中祖先崇拜和祖先祭祀是维持强化家族或宗族成员凝聚力的重要方式。祖先崇拜并非中国所独有,从世界文明史上看,其他很多民族也有祖先崇拜,甚至直到今天,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还保持着祖先崇拜的传统。而中国的祖先崇拜与祖先祭祀特别发达,为治史者所熟知。那么中原文化祖先崇拜的特征是什么呢?其中关键就是,中原文化的祭祀重人事、重实用,不务宗教的玄想而务实际,宗教祭祀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特征非常明显。致用观念形成很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种务实讲究实用的观念体现在社会政治形态上,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血缘意识,即相信具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能够同心同德,血浓于水的血亲关系是最可靠的。这种意识也是后世三代王朝血缘政治运作的心理情

感基础,从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族类意识。血亲组织的存在与血亲意识的浓厚,使早期社会在提升血缘家族、宗族组织的向心力以及强化内部组织的体制中,将祖先崇拜及相关的丧葬、祭祖礼仪视为极其重要的方式。这在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贵族墓葬、宫殿建筑、祭祀遗址等中都有鲜明而充分的体现。这种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制体系,其特征是将宗教祭祀与社会组织、政治分层体系结合,以世俗化的政治体系来组织整合宗教祭祀,并利用宗教信仰来促进政治体成员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强化宗族成员的血脉联系,建构世俗政体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宗教的政治化、礼制化是华夏文明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特征。由于祭祀的礼制化和政治化,祖先崇拜和祭祖礼仪被更多赋予了社会政治功能,即祭祀是为了实现族内的权威认同和族人的团结。“祖宗”是血缘认同的源泉,史前社会的祖先神像、中原地区的神主,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族徽,均是族类认同的符号,是凝聚宗族成员的精神力量。祖先崇拜被赋予了人文意义,如崇德报功、报本反始等道德内涵,这种道德意义反过来又促进了血缘组织内成员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因而,中原地区建立在血缘族类意识基础上的祖先崇拜是一种政治统治策略和政治治理方式,具有世俗化、理性化特征。体现于考古学上,如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关注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7],缺乏巫教偶像崇拜,祖先崇拜与祭祀的目的是为了家族或氏族的生存与发展。从玉礼器看,良渚文化之后散见于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玉、石琮,一般形体矮小,纹饰简单,而未见到如良渚琮上繁缛的兽面纹及鸟纹^{[8]21-33}。陶寺文化的玉礼器少见良渚文化的神徽等宗教色彩,宗教色彩已相对淡薄^{[9]466-477},更重在权利和财富等世俗观念的体现^[10]。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石磬和彩绘蟠龙纹彩陶是王室权威的象征性礼器,均与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巫术色彩浓厚的礼器不可同日而语。总之,与周边相比,龙山时代的中原社会宗教巫术色彩淡化^{[2][7]}。陶寺文化墓葬,其随葬品更多地表现为世俗权力的集中和财富的占有,带有神权色彩的遗物甚少^{[11]104-119}。陶寺文化的器物制作多是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陶、石器等,

即使与祭祀有关的器具也多是以酒器、食器等容器构成的礼器^②。可见中原文化不仅仅是吸取周边地区的优秀文化,而且淡化其宗教色彩,突出其世俗的实用意义,具有实用理性。

(三)文化向心力和政治宗教的向心性

中原地区是周边文明的汇聚之地,七千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花心”地位的中原都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中心,是文化与民族融合最主要的大熔炉^[12]。严文明认为,中国的民族和文化从史前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或曰多元一体结构。中原的华夏文化处在花心的位置,周边文化乃是不同层次的花瓣。外圈对内圈的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华文化连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13]。赵辉指出:“到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出现了几支亲缘性很强的地方文化,……它们面貌相近,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结成一个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态势已经形成。”^[7]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演进趋势,也使得中原地区荟萃四方之精华,从而具有更高的位势层次和更强的“能量场”,对周边形成了向心力和巨大的团聚融合能力。中原文明之所以居于这种花心地位,除了地理区位优势 and 兼容并蓄的文化胸怀,还与这种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具有的内聚力、文化向心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等优势有关。

中原文明的向心性、内聚性,还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古人认为地中、土中在中原,尽管上古时期的“地中”随着时代不同或有所不同,但基本不出中原^[14]。上古盛行盖天说,以为大地是平坦的,故认为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顶”即“天之中极”只有一个。对应“天之中极”的“极下”地区,就是“土中”或“地中”。古人认为,地中与天极是对应的,唯有这里才是人间与皇天上帝交通的孔道,王者独占地中,实质上就是绝他人通天地的权利,垄断与上帝沟通的宗教特权,从而达到“独授天命”“君权神授”合法化和正统化的政治目的,将宗教意识形态转化成王权政治意识形态,后来发展成为所谓的“中

道”。王者只有逐中、求中、得中、(独)居中,在地中建都立国,才能名正言顺地受天命,得帝祐,延国祚,固国统^{[15]116}。地中或中土是天命的中心,也是中原占据文化优势的一个关键原因,亦是中原具有文化向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原文化具有的内聚性、向心性使中原文化场具有强大的文化吸附力,进而成为强大的文明共同体并向外辐射^③,为后世三代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早期中原社会的文化观

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于人群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中原大地上,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考古学面貌大同而小异,说明各地之间的信仰、生活方式具有统一性,这些人群同文同种,更容易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共同的文化认同又进一步促进了族群的融合凝聚。中原地区在兼并融合的文明化进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文化观念。

(一)以德治理的道德政治理念

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各部落之间没有大的天然屏障隔绝,容易形成大的文化共同体。黄河流域不同的邦国部族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或战争,或联合,或通婚,但总的趋势是逐渐凝聚成更大的政治实体。龙山时代的中原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元性,其文化的同质性远远大于异质性,说明这些邦国部族都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可能是同属一个政治联合体或政治共同体,具有深度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中原地区广泛分布的邦国部族是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上的,这就造成了血亲意识与族类理念的发达。在文明化进程中,如何超越“非我族类”的狭隘血缘族类意识,从而凝聚成更大的族团,进而形成早期国家,这是早期中原社会面临的问题。聚落部族的兼并可以依靠战争征伐,但兼并后的社会治理则需要一套政治制度和政治策略,需要依靠伦理道德和礼仪制度来进行整合。难以设想在早期中原社会中仅仅靠武力和刑罚,就能够维持族群的和平相处并凝聚成为庞大的政治实体。其中必然有社会长期演进中积淀的政治策略和人群和平相处的政治智慧,来

支撑中原社会由兼并到融合,来应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挑战。如何炳棣所观察到的,渭水下游南岸诸小河沿岸仰韶早期聚落星罗棋布、鸡犬相闻的景象,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人们(甚至他们若干世代的祖先)已有必要的智慧来避免暴力冲突,并意识到培养相互容忍、尊重彼此生活空间是共存共荣的先决条件。频繁的接触、知识和技艺的交换互利,再加上同语(文)同种这些重要因素,使得仰韶先民我群意识扩大和彼群意识相应缩小^{[16]23}。龙山文化时代的中原,其文化具有统一性,虽然有小异,但大体上反映出族群之间文化的高度共性,体现出中原族群高度的文化认同。上古社会族群之间“始而相争,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17]12}。族群之间交错杂居、通婚、文化融合,进而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逐渐使狭隘的族类观念消失,进而形成更大的族类观念,使“我者”“他者”的彼我界限以文化认同为标准。华夏民族就是在这滚雪球般的文明化进程中,不断扩大族类的包容性及其边界。即使在族群兼并中,上古华夏先民还存在一种独有的“兴灭继绝”的伦理观念和制度。何炳棣指出,这种伦理观念制度,能将生命延续的愿望从“我”族延伸到“他”族,“华夏”这个种族文化圈子就越来越大,几千年间就容纳进越来越多本来“非我族类”的人群与文化^{[16]24-25}。

政治体内不同族群融合,主要依靠的是德。我们不能低估上古华夏先民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策略。道德政治在史前社会已经萌芽并逐渐付诸政治实践^④。父权血缘氏族组织的发达,导致早期政治共同体内非常重视以血缘纽带整合社会关系。《尚书·尧典》记载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即反映了早期社会社会治理方式的特征。这种由家族到国家的治理模式是建立在血缘宗族情感基础上的,族邦内成员的整合是利用血缘关系相亲附,以增进政治体的内聚力、向心力,其原则是建立在亲缘情感基础上的亲亲之德。因为血缘亲情的存在,礼成为重要的整合方式,形成了一种血缘性很强的以德礼为核心的社会控制体制。《尚书·舜典》云“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史记·五帝本纪》载“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

服”。《孟子·离娄上》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这些文献记载不能简单地视作古人的向壁虚构，而是有其合理性成分在内。在政治联合体内存在很多其他血亲组织，部族邦国之间的关系原则是依靠道德文教，不断地将新邦国部族纳入政治共同体，以“协和万邦”。这是一种世俗性的道德政治模式，其政治理念超越了狭隘血缘族类的束缚，能在很大程度上建立更广大的政治团体，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就是中原大地上大大小小邦国部族的融合聚集进程。在族群之间的融合中，宗教信仰也在融合，并衍生出世俗的崇德报功和报本反始的道德观念，由此逐渐形成了共同体道德意识。《礼记·祭法》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顓頊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尝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尝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可以看出，史前至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崇德报功、报本反始的道德意识具有普遍性。从西周青铜礼器鹵公盃对于大禹的讴歌看，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共同体有共同的道德观念，就是崇德尚功、报德的道德观，其与上述“兴灭继绝”的伦理道德观念一起，体现出华夏先民的政治智慧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族类概念，具有一种“协和万邦”的广阔胸怀。

（二）崇质尚朴、贵本节用的价值观

从考古学看，中原史前文化呈现出崇质尚朴、贵本节用的特征，具体体现于丧葬、祭祀、礼器等方面。

中原地区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随葬品量少质朴，呈现出薄葬之风。以三门峡灵宝西坡墓地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大墓，阔大墓室内随葬精美玉钺以及成对大口缸、簋形器等陶器，彰显出墓主人具有崇高地位，但随葬品最多一墓不过10余件，且多为粗陋明器^{[18]298}，显示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序、朴实执中的特点^{[19]194-208}。河南孟津妣娵遗址仰韶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M50，面积20.86平方米，底部设有生土二层台，内置内壁涂有朱彩的单木棺，棺底散见朱砂。墓主为一青年男性，手臂还佩戴有象牙箍，显然是一位氏族权贵，但除了棺槨和佩戴的象牙箍显示其权威外，却并不见有更多的身外之物^{[20]143}。王

湾三期文化也呈现出薄葬的风格，伊洛地区的龙山墓葬，随葬品普遍量少，罕见奢侈品。

中原地区的祭祀相对比较俭约，缺少大规模祭坛和宗教礼仪建筑，这与中原周边的一些考古学文化如良渚文化的祭坛和贵族大墓，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大墓、女神庙以及祭坛，凌家滩文化的玉器和随葬品，形成鲜明的对比。周边这些邦国神权政体重视宗教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往往会随葬高端奢侈品，呈现出一种基于宗教性信仰的崇尚奢华之风。

中原地区的宫室建筑是“茅茨土阶”，“卑宫室”，缺少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那种大型宗教性建筑。一直到夏商时，宫室建筑还主要是夯筑土墙，使用取材方便、加工容易的建材，这种土木结构建筑的能量消耗较小。这不可能仅仅是由于民力匮乏、受建筑技术和材料局限的原因，其主要原因应是出于一种俭约的主流意识形态。宫室建筑能量消耗小可以节约民力物力，“不误民时”，以使更多的民力从事农业生产。再者，中原地区的宗教形式主要是祖先崇拜，与西方国家那样脱离世俗生活的单独宗教场所不同，中原地区的宗教与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宗庙中可以举行很多政治社会活动，宗庙既是神圣的宗教空间，也是一神圣性的世俗空间，体现出中原社会一种独特的理性精神。如禹州瓦店遗址高等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WD2F1)，在夯土建筑基址中以及在“回”字型夯土建筑院落的垫土中，均发现人性遗骸。该房址或为宗庙类建筑，但其规模与周边文明的宗教性建筑不可同日而语，体现出中原文明的实用理性和崇尚节俭的节用意识，以及不尚奢华的务实、质朴作风。

崇质尚朴的另一重要内涵是重视事物的功用性、实用性^⑤。中原史前墓葬随葬品以陶饮食器为主，饮食器主要是鼎、豆、甗、甗、鬲、盨、盆与双耳罐等，可见中原社会有一种重食器的传统。中原地区的礼器以陶礼器为主^⑥，朴素无华，缺少奢华气息，显示出中原社会的务实性以及黜奢崇俭的价值取向。礼器是为了行礼之用，用于建构礼仪形态，世俗性秩序建构是其主要功能。因为重视事物的实用功效，故崇尚素朴，反对奢华浮薄和雕饰美文，反对享乐主义。因而史前中原文化中的尚质贵朴风尚也体现出这种

实用主义心态。

考古材料反映出的中原文化的俭朴质略风尚,文献记载也有所反映。《礼记·郊特牲》记载后世祭天时“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载:“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气。血腥粢祭,用气也。”这种扫地而祭、器用陶匏、祭祀用血和生肉的礼仪其实是史前社会祭祀的孑遗,即《礼记·礼器》所说“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此所言之“古”,即人类最初的简朴礼仪形态。《礼记·郊特牲》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左传·桓公二年》“大羹不致,昭其俭也”,言朴质之物具有昭示俭约之义,实际上是上古时期举行礼仪的俭约风格写照。又《韩非子·五蠹》载:“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彩椽不斫,粢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上博竹书《曹刿之阵》云:“昔尧之飨舜也,饭于土簋,啜于土型(铜),而抚有天下。”^⑦土铜即陶铜。《论语·泰伯》:“禹,吾无间然矣,非饮食而致孝鬼神,恶衣服而至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这些文献记载尽管是东周人的追溯,但儒家、墨家、法家均说尧舜禹节俭,可见是诸家的共识,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的编造,应有其真实性的素地。

崇尚节俭的原因,和中原农耕文明的生业方式有关。农耕为生计之本,中原百姓土中刨食,耕作艰辛,物力维艰,一丝一缕、一粥一饭均来之不易,故黜奢崇俭,反对安逸和嗜欲无节。如《尚书·皋陶谟》云:“无教佚欲有邦。”《尚书·无逸》云:“不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农耕民族靠天吃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务实于稼穡方可维持生计。《尚书·酒诰》云:“惟土物爱。”因为生计艰辛,故需节用尚俭,“俭所以足用也”^⑧。即使是勤勤恳恳稼穡之业,但遇上旱涝蝗虫等灾害,也会导致收获不定,因此不节用则无以维持个人和族群的生存,而统治阶层靡费财物、奢侈淫靡则会导致民力不堪而人心离散^⑨,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于是节用成为史前社会至后世王朝的共识。也因此,中原地区在文化心态上形成了以追求实用为目的的务实风格,风俗民情不尚奢华,崇尚俭朴淳质,在宗教祭祀上能量消耗较小。

(三) 中和之道与尚中观念

中原史前考古学文化给人一种内敛、中规中矩、不走极端的感觉。中原地区吸收四方文明精华然后加以融合创造,改造了其中“怪力乱神”的成分,缺少巫术狂热氛围,显得比较中和。许宏认为,中原地区的玉礼器少见或罕见具象造型,图案抽象化,而周边的非礼乐系统文化或巫术文化,流行神像、人物、动物等雕塑品,重视视觉冲击力^{[21]554}。中原礼器呈现出世俗化取向,重视世俗性的饮食礼器,造型与装饰少见怪异形象,陶器纹饰以绳纹与篮纹为主,也有方格纹等,美学特征比较中和,质朴无华,这应是一种有意的人为约束导致。中原文化这种不走极端的中和特质,似乎表明这是华夏先民共同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追求。

据先秦秦汉文献记载,上古中原社会推崇“中”的治国理念。如《论语·尧曰》:“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帝誉“执中而获天下”。《礼记·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逸周书·度训解》:“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爵以明等极,极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顺政。”清华简《保训》记载上古帝王以“中”治理天下:“昔舜旧(久)作小人,亲耕于历茅(丘),恐求中。自诣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诣,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厥绪。”^{[22]143}东周各家各派均将“中”的理念追溯至上古时期,应不是臆测之辞。什么是“中”?各家说法言人人殊,令人目眩。其实,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其意即中道^⑩,即适度 and 平衡,不走极端,无所偏颇。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中”,是指治国施政的理念。“执中”,或称“制中”“立中”,体现在施政上即重视人伦关系,对百姓加以伦理道德与礼乐教化,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如《尚书·舜典》载“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考古学上看到的城址、宫室建筑、礼器、祭祀遗存、贵族墓葬等都是当时社会控制和社会

整合的产物,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物化遗存。中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统一性表明有一只手在推动文化由多元向统一,显示出中原地区有一种广泛的文化认同。龙山文化时代,为了应对挑战,中原社会有意识的政治上联合,文化上融合,从而在文化面貌上趋于一致。考古学表明,史前中原有“礼制化趋势”,陶寺遗址出土的礼乐器,禹州瓦店城址出土的黑陶礼器、玉礼器,均反映出统治阶层曾有意识地进行礼制创制和强化礼仪形态的建设^①,这与《礼记·礼运》所言上古时期“礼义以为纪”的记载是一致的。中原龙山文化时代的文化统一性,意味着风俗、礼仪规范的基本统一性,这是政治体推行礼乐政教的结果,文献也表明这点,如《商君书·画策》说:“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史记·五帝本纪》载:“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执中而治,其旨内则“咸和万民”(《尚书·无逸》),外则“和合万国”(《史记·五帝本纪》)。

上古时期礼法始兴,以求厥中。中原社会的政治社会治理不走极端路线,而是选择不偏不倚的“中”,即“中正”“中道”,其表现即以礼制来约束社会成员。对于个人来说,中的体现是节制人的欲望,反对奢侈淫靡,行事有节度,不走极端。对于统治者而言,礼制可以有效地扼制贵族的贪欲无限制膨胀^{[23]51-89},从而不至于使权贵阶层过度奢侈而激化社会矛盾。中原社会以道德礼制规范人的行为,从而使中原文化呈现出一种节制、内敛、朴质尚俭的风格。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以及中原文化的统一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中和”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在中原文明化进程中已经存在且付诸政治实践中。虽然也可能并不是以“中”名之,但类似的“中和”意识最早可以上溯至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当无异议。这种中正质朴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尚中”的文化观念,一方面是华夏民族长期演进而形成的文化品格,另一方面更是中原社会礼制建设、推行礼乐教化的结果。

注释

①参见韩建业:《最初的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收入《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0页。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收入《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244页。③华夏文明的演进模式是辐辏与辐射模式,参见邵望平:《礼制在黄淮流域文明形成中的作用》,收入《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90页。④早期社会将伦理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学界或称为“伦理政治”,本文称之为“道德政治”。⑤《墨子·辞过》曰上古圣王,“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仅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31页。《盐铁论·通有》:“古者,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衣布褐,饭土飧,铸金为锄,埴埴为器,工不造奇巧。”参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页。⑥如陶寺文化大墓中以陶礼器为主。其他如禹州瓦店、登封阳城、新密新砦等遗址均以陶礼器为主。商周时期部分君王奢侈淫靡导致名声很坏,可见节俭是一种主流意识,是不争的事实。⑦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⑧见《国语·周语中》。⑨《韩非子·十过》载,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问之曰:“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原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常何以?”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问道于子,子以俭对寡人何也?”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所出入者,莫不实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书其内,纓帛为茵,将席颇缘,触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⑩“中”最初乃是立表测影之圭表,进而引申为政治意义上的中正之义、圭臬之义。参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⑪李新伟认为,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构建的社会上层交流网及以之为媒介的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的交流,应是促成各地区一体化的更重要的推动力。参见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 陈良佐.从生态学的交会带、边缘效应试论史前中原核心文明的形成[M]//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
- [2]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J].文物,2000(1):41-47.
- [3] 王巍.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发言摘要[J].考古,2001(2):86-95.
-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 [5] 张海.从瓦店遗址看中原地区国家文明的起源:《禹州瓦店》读后感[J].华夏考古,2005(1):109-110.
- [6] 韩建业.略论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M]//原史中国:韩建业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
- [7]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J].文物,2006(8):50-54.
- [8] 许宏.礼乐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M]//三代考古: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 [9] 高炜.陶寺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M]//襄汾陶寺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10] 高炜.龙山时代中原玉器上看到的二种文化现象[M]//襄汾陶寺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11] 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M]//良渚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 [12] 张学海.新中原中心论[J].中原文物,2002(3):7-12.
- [13]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J].文物,1987(3):38-50.
- [14] 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J].考古学报,2015(2):129-156.
- [15] 何弩.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M]//三代考古: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 [16] 何炳棣.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M]//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7]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19] 韩建业.西坡墓葬与“中原模式”[M]//原史中国:韩建业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
- [2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大学考古系,编.妣与寨根[M]//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编.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 [21] 许宏.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M]//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 [22]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1.
- [23] 邵望平.礼制在黄淮流域文明形成中的作用[M]//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View of Prehistoric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Cao Jiandun

Abstract: The Central Plains is located in the confluence of north-south and east-west transportation, with smooth information flow and wide communication. It has the ability to absorb and transform heterogeneous cultures.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did not care about religious fantasy, but practical and practical. Ancestor worship and sacrificial rites were endowed with more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The pragmatism and utilitarianism of religious sacrifice were obvious. In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evolution, a value orientation of secular rationality and pragmatic application has been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d long-term political practice, the Central Plains society had gradually formed a moral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a moral political model and a moral political concept of governing by virtue. It regulated people's behavior by morality and restricts social members by etiquette, which mad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have a cultural temperament of introverted, restrained and neutral, and also made the Central Plains society form a simpl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with the political view of advocating neutralization. Th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cepts of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made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cohesive, centripetal and strong cultural adsorption, which made it easier to form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posit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view;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云 扬]